

东北亚政治与外交

# 中美在东北亚的战略博弈： 间接路线与类型混合

刘雪莲 范 为

**【摘要】**奥巴马时期,美国在东北亚的“再平衡”战略已经部分地摒弃了原有的“离岸平衡”模式,转移到了“选择性介入”“新自由国际主义”“间接路线”三种类型混合的模式上来。“选择性介入”使美国着力在东北亚地区建立压倒中国的集中性战略优势;“新自由国际主义”促使美国在东北亚地区建立以民主国家性质为基础的同盟网络;“间接路线”则使美国在东北亚利用地区国家间的纠纷、矛盾增强同盟凝聚力,扰乱中国心理稳定,保持地区适度紧张,形成有利于美国主导地位的局面。特朗普时期,“间接路线”越来越凸显,而类型混合的“组合拳”也有明显体现。这在某种程度上不仅加深了中美之间的战略互疑,还使中国的周边环境陷入了动荡不安的状态。对此,中国应该从加强与美信息沟通、在非核心利益问题上达成战略妥协以及在共有原则上形成基本共识等三个层面明确彼此战略意图、缓释战略互疑。同时加强与美国在东北亚地区的战略协作关系,积极塑造东北亚“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高地。

**【关键词】**中美关系;东北亚;选择性介入;新自由国际主义;间接路线

**【中图分类号】** D820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13654/j.cnki.naf.2018.06.003

**【文章编号】** 1003-7411(2018)06-0032-(17)

**【收稿日期】** 2018-06-26

**【基金项目】**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16JZD027)

**【作者简介】** 刘雪莲,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国际政治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范为,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国际政治专业博士研究生。(长春 130012)

中美关系如何定性,特别是美国如何看待中国,这一问题往往从美国定期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能够体现出来。报告会系统阐述美国在全球的利益、目标以及实现这些利益和目标的途径和手段。名为安全战略,实际上就是美国的全球战略<sup>[1]</sup>。特朗普上台之后,中美关系由执政初期的不确定性逐渐走向了明朗的竞争关系,在2017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和《美国国家军事战略报告》中,明确将中国确定为“战略对手”。2018年初开始,中美之间

**NORTHEAST ASIA FORUM**

的贸易摩擦愈演愈烈,迟迟没有缓和迹象。同时,中美关系的发展也影响着世界其他国家,尤其是中美的贸易摩擦必然带来世界经济的波动,使中美关系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本文从冷战后美国的几个典型的战略思维出发,分析中美关系的矛盾性及其在东北亚地区的表现,从而对中美关系的未来进行思考。

## 一、金融危机后影响美国对外政策选择的几个战略思维

冷战结束后,特别是在21世纪的头十几年中,关于美国大战略的讨论都围绕着这样一个基本点,即如何以最少的权力资源实现维持美国全球领导地位目标的最大化。尽管美国“对其霸权是否真正衰落仍存争议,但对以美国霸权衰落为基点制定中长期战略却有着重要共识。”<sup>[2]</sup>这种基本共识渗透到了美国对全球各区域的战略制定和实施之中,在中国逐渐崛起之后,美国战略的关注点也集中在了东北亚地区。

自“布什主义”宣告失败之后,美国进入了“战略克制”时期,各种战略克制思想相互碰撞,对美国现实大战略的制定产生了重要影响,美国的亚太战略当然也受此影响。其中,对规则、制度、民主体系倍为推崇的“新自由国际主义”,主张关注对美国有至关重要影响的关键地区的“选择性介入”大战略,以及关注非军事化角度的“间接路线”战略,对美国对外战略的选择有较深的影响。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在美国国家实力相对衰减和亚太地区局势发生重大变化的背景下,美国国内就美国应在亚太地区实行什么样的大战略展开了争论,对美国在亚太地区国家安全的威胁和潜在的竞争对手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以及特朗普政府的“印太战略”也离不开上述理论思维的支撑。

首先,“新自由国际主义”战略是一个着眼于以规则、制度安排和西方宪政秩序维系美国霸权的大战略。该战略主要有约翰·伊肯伯里(G. John Ikenberry)、安妮—玛丽·斯劳特(Anne-Marie Slaughter)等代表人物。主要战略思想是:其一,民主国家的联合。开放性的民主政体将世界上大部分的工业化发达国家联合在一起,形成了以美国为中心,以同盟伙伴关系为形式,以“降低权力回报,获取制度回报”为目的的关系模式。这种关系模式不仅缓解了西方国际体系内权力不平衡带来的影响,还使“华盛顿成为它们大多数相互之间关系网的聚集点”。<sup>[3]</sup>最为重要的是,民主国家的联合保障了西方宪政秩序“可以压倒任何其他的全球秩序”<sup>[3]</sup>的优势地位。这对维系美国全球领导地位的意义不言而喻。其二,护持美国霸权的制度安排。根据“新自由国际主义”的观点,制度具有影响和内化于国内政治和社会结构的功能,加之制度之间及与其他行为体之间的密切联系,使变革制度所需的资本急剧增加,“潜在的秩序与潜在的霸权国家越来越难以同现存的秩序与处于领导地位的国家进行竞争并取代它们。”<sup>[3]</sup>制度对主导国“霸权”的锁定功能更加剧了这种趋势。“制度化的秩序可以“锁定”对它有利的安排,这种安排可以在它的权力顶峰之后继续存在下去。因此,建立基本的、发挥作用的制度是霸权对未来的一种投资形式。”<sup>[3]</sup>其三,权力关系网络。学者安妮—玛丽·斯劳特(Anne-Marie Slaughter)认为“在一个权力分散的‘网络化世界’或‘多节点世界’中,国际社会的等级性结构逐渐被网络化结构所取代”,<sup>[4]</sup>“不再是相对实力,而是在日益密集的全球网络中的中心地位”<sup>[5]</sup>才是维系美国霸权的关键所在。

其次,“选择性介入”战略是在“关键地区”维持军事力量“集中性优势”以震慑潜在对手的大战略。“选择性介入”战略是以美国霸权衰落为假设前提的,因而其出发点是承认美国权力的有限性,并研究如何以有限的权力资源来维护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美国学者罗伯特·阿特(Robert J. Art)是该战略的主要倡导者,他“主张将美国的主要政治军事资源集中投入到对美国具有重要影响的地区,即其所处的西半球、欧洲、东亚和波斯湾地区”,<sup>[6]</sup>并在“关键地区保持一种集中性优势,促成‘对美国有利的均势’和‘深度和平’”。<sup>[4]</sup>为此,美国需要在关键地区维持军事上的优势地位以震慑对手,遏制破坏地区均势的行为。为了减少战略成本,“选择性介入”战略“还要求美国推动地区安全多边机制的建设,与地区安全伙伴分摊负担,促进地区安全多边机制与美国双边同盟关系的配合。”<sup>[4]</sup>

最后,“间接路线”战略是用“迂回”的方式扰乱对手“心理稳定”以实现战略目标的大战略。“在国家大战略领域,所谓间接战略就是在国际关系中,采取非军事手段来实现国家安全的战略,所以,在大战略领域,间接战略是对政治、经济、外交等非军事手段的综合运用。‘间接战略是以心理战和计谋而不是以武力为主要因素。’,其‘战略本质是减少实现目标的代价。’”<sup>[7]</sup>法国战略学家安德烈·博福尔认为,“间接路线战略的特点就是使用军事胜利以外的方式取得某一结果。”<sup>[8]</sup>“间接路线”战略的首倡者,英国战略学家利德尔·哈特认为以“迂回”而非正面对抗的方式更易获取胜利。从这个角度来讲,“间接路线”战略的另一大特点便是以最小的权力资源实现战略目标的最大化。在美国霸权力量相对衰落的今天,“间接路线”战略对美国大战略的实施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这几种比较典型的战略思维在冷战后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对外战略中都有所体现。应该说明的问题:一是在很多时候,我们很难清楚地区分是思维指导了现实,还是现实中反映出的思维,事实是战略思维与战略选择经常是结合在一起的,因此,文章中并不对此进行细致的划分;二是这几种战略思维和政策选择都不是孤立的,有时某种战略占主导,更多的时候是混合使用的。东北亚地区是中美战略博弈比较集中的地区,也是美国几种战略思维有突出显现的地区;三是虽然特朗普上台后极力否定奥巴马的对外政策,但是,总体上特朗普的政策也离不开美国几种典型战略思维的影响,有变化但更多是继承。本文以奥巴马时期为主进行阐述,但同时关注到特朗普时期的表现及变化。四是论文题目中用“博弈”一词主要是为突出中美关系中的矛盾性,而不是在方法论意义上使用的。

## 二、从美国三种战略思维看东北亚地区的中美关系

东北亚对于美国而言具有重要的地缘战略价值,首先,根据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带理论,东北亚地区正好处于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作为海陆过渡带一直是维护美国海权的重要地区,斯皮克曼认为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蕴藏着统治世界的巨大潜力,从维护美国霸权的视角出发,在边缘地带国家中建立一种均势以限制其力量的发展是最好的方法。其次,东北亚地区有经济活力强大并与美国经济联系密切的中、日、韩三国,加强与这一地区主要国家的交流关系,对美国经济的复苏具有重要的意义。再次,美国的东北亚同盟体系是美国在亚太地区安全架构的基石,任何对美国亚太地区同盟体系的不满都被视为对美国主导下的地区秩序现状

的不满。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成为美国在欧亚大陆制衡的主要对象;而中国的经济优势,使东北亚地区逐渐形成了经济靠中国、安全靠美国的二元结构,中美在东北亚地区的战略博弈形势日益凸显。而中美在东北亚地区的战略博弈在以上几个方面的战略思维中有比较充分的体现。

### (一)从“新自由国际主义”的视角来看,中国的崛起是非西方国家的崛起,对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会带来挑战

冷战时期,美国为对抗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而建立起一套美国主导下的民主扩展、市场经济、自由贸易、航行自由等全球与地区多边制度,以维护其“自由世界”的秩序和美国霸权的合法性。冷战结束之后,美国将扩展民主作为其外交政策的核心,在世界范围内推广美国的民主价值观念和市场经济观念。然而,“9·11”之后,美国国内新保守主义势力上升,小布什政府的霸权和干涉的政策实际上破坏了美国建立起来的国际秩序规则,而中国等一些新兴国家的崛起,也要求对现有的国际秩序进行变革。

曾经,美国想塑造一个自由的中国,他们认为,“自由化的中国将会是一个没有区域或全球霸权野心的民主与和平的国家。”<sup>[9]</sup>并会成为美国全球责任的分担者和霸权护持的重要助力。然而,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改造中国的相对实力优势受到削弱,而在全球经济衰退中依然坚挺的中国正对自身政治制度的优越性充满信心。与此同时,中美之间权力转移的趋势越来越显现,中国对核心利益的重新界定与对区域平等地位的强烈诉求都彰显了这一点。美国等西方国家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中国还强调了指向多极化的和谐世界论与‘国际关系民主化’……中国崛起带来的国际政治意义并不是为今后走向西方化做准备”。<sup>[10]</sup>美国学者伊肯伯里认为,“中国不会继续满足于在以美国为中心的秩序中处于从属地位”,“中国所发表的言论,特别是中国表示促进世界秩序由美国霸权转变为多极世界的做法,就是想更加清楚表明这一点。”<sup>[3]</sup>

那么,美国如何在东北亚地区调整其战略以体现其“新自由国际主义”思想呢?

首先,美国在东北亚地区塑造民主国家同盟网,追求同盟效能最大化。奥巴马上台之初,为了稳固美国在东北亚的同盟体系,奥巴马政府从民主国家的共有原则入手,“考虑将其在东北亚地区的轴辐同盟体系转变为一个多边性质的民主同盟。”<sup>[11]</sup>美国要在东北亚地区塑造民主同盟的主要原因是,民主国家的性质更容易促进同盟内部的稳定性;民主国家间相似的政治、经济体制使相互之间的制度联系极为紧密,这增强了彼此间战略承诺的可信性,减少了对被盟友抛弃的担忧,为同盟关系提供了双重保障。这些因素不仅降低了民主同盟国家之间发生冲突和战略对抗的可能性,也促使了彼此之间采取一种更为积极的姿态处理彼此之间的关系,从而为联盟提供了更大的稳定性。“美国的亚太盟国均为民主国家,这也是美国亚太联盟在冷战后存续与强化的重要原因。”<sup>[11]</sup>

在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力图通过“重返亚太”和“亚太再平衡”战略塑造东北亚地区的力量均势,维持美国在这一地区的主导权。此时,日韩两国都需要新的合法性基础来坚定战略目标,美国也需要重新强化同盟的凝聚力,这正是奥巴马政府大力宣传共同原则和价值观念对于美国及盟友意义的现实基础。2010年,“奥巴马政府在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明确

提出‘价值观利益’是美国的一项持久利益”。<sup>[12]</sup>2011年,奥巴马总统在澳大利亚国会的演讲中表示,“作为一个太平洋国家,美国将坚持核心价值观和盟友的密切伙伴关系”。美国对民主价值理念的推介,得到了其东北亚盟友的响应。日韩两国领导人都曾推出价值观元素的外交理念,例如李明博政府的“价值同盟”和安倍政府的“自由与繁荣之弧”。李明博政府的“价值同盟”贯穿于其执政期始终,他认为,“韩美两国共享自由民主主义和市场经济价值,如果在此基础上韩国不断实现民主主义和经济的发展,两国就能建立更为成熟的价值同盟。”这个外交理念不仅引导了美韩向着制度化同盟的演进,还促使两国的同盟关系向着全球伙伴关系和核心同盟关系的定位迈进。而安倍政府的“自由与繁荣之弧”则更具有配合美国东北亚“再平衡”战略以“牵制包围”中国的意味。

与此同时,奥巴马政府也加强了对民主同盟的网络化塑造,以增大同盟体系的使用效能。网络化的重要作用在于,“如果处于在不同利益下形成的多种临时性组合的结点,能与其他利益攸关者和重要力量建立相连性,就会成为最有权力的国家。”<sup>[13]</sup>换言之,谁掌握了同盟网络化的中心结点,谁就具有了地区的绝对权力优势。为此,美国采取了一系列制度化手段促成东北亚民主同盟网络的形成。例如,将美日、美韩的外长、防长“2+2”会议拓展成美日韩三方会议,利用 TPP 和 FTA 从经济层面上拉拢美日、美韩关系,改善美国“轴辐”体系中盟友间联系匮乏的局面,将美日韩同盟的网络化以多层面的制度固定下来。同时谨防东北亚形成不利于美国利益的地区机制,牵制东北亚地区的合作,维持东北亚地区合作的“碎片化状态”<sup>[14]</sup>。具体而言,在安全与政治层面,2015年4月27日,美日两国外长、防长“2+2”磋商会议正式修改《美日防卫合作指针》,扩大了日本自卫队对美国军事行动的支援范围,使日本更加深入到美国全球军事战略的框架中。2016年10月19日,为应对朝鲜威胁,美日韩“2+2”会议通过决议建立了进一步制裁朝鲜的机制 EDSCG,即延伸威慑战略磋商机制,这个机制在促进军事、战略磋商的同时,也会涵盖关于进一步制裁的外交和战略问题。

在特朗普执政之后,在同盟关系问题上,他多次表示,“美国盟友需要为美国的安全保护做出经济补偿,否则他们就要为自己的防务承担责任”。这些言论使盟友担心同盟关系的变化,特别是在东亚,“随着中国实力的增强,盟友国家越来越冀望于利用美国力量来平衡中国,并从中牟利。然而,这可能增加美国在亚洲卷入冲突的风险。因而,特朗普认为,现有的同盟体系存在重大不足,美国一直在为其盟友的安全与防务买单,而他们却可以享受红利,故盟友体系需要进行根本性变革。”但是,这些言论和认识并不等于他要放弃同盟关系。因为“同盟体系仍是美国维持全球优势地位的战略需要”;同时也受“同盟体系的制度惯性”“美国的外交决策机制”,以及“特朗普的个人经历”<sup>[15]</sup>等多方面因素的作用,只不过,在盟友的义务承担方面,奥巴马时期虽然也提出过,但没有实行,而到了特朗普时期,比较坚决地去做了。

同盟关系的强化,不仅使东北亚地区处于分裂,很难实现地区的整合,而且使中美关系特别是安全关系始终处于对抗状态。

其次,从“新自由国际主义”出发,美国利用规则消解中国维护国家主权行为的合法性基础,削弱中国的地区影响力。

2015年,奥巴马总统在与习近平主席的两次会晤中,都谈到了对航海自由和飞越领空自

由原则的尊重和维护,这从侧面证明了航行自由原则对美国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因为美国在全球公域的军事航行自由是维护美国全球霸权的基础,也是保障美国军事灵活性和安全优势地位的前提。在美国的官方宣言中,“再平衡”战略的最终目的之一就是“航行的自由不被违背”。美国希望包括像航行自由这样的原则“通过自身和盟友的努力……在新的地区经济与安全架构中充分体现出来”。<sup>[16]</sup>

在东北亚地区,海空自由航行原则不仅保证了美国对东北亚地区的自由介入,保证美国在关键地区的军事存在,还保证了美国对地区突发事件的战略反应能力和对中国的前沿军事部署。因此,中国东海防空识别区的建立在美国看来不仅是违背了国际规则,也是对美国在东北亚地区的安全优势地位的挑战。由于东海防空识别区涵盖了包括钓鱼岛在内的中国东海空域,美国担心东北亚地区秩序也会因此发生变更。为了消解中国建立东海防空识别区的合法性基础,美国加大以其主张的海空自由航行原则规范中国行为的力度,并以共有原则之名最大限度地团结地区“民主同盟”和伙伴,“同时宣称如果中国继续违反这些国家原则将受到地区其他国家的抵制,陷入自我孤立的境地”,将矛头直接对准中国,为进一步压缩中国的战略发展空间提供合法性基础。

特朗普上台后,积极以“印太战略”取代“亚太再平衡”战略,强调海洋的自由航行,强调美国军事力量在海洋的前沿部署,并不断派遣舰船进入到中国海域。在2018年6月1日至3日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发言时,无端指责中国将南海岛礁“军事化”<sup>[17]</sup>,宣称中国在南海岛礁上部署武器的目的是恐吓与胁迫周边国家,南海成为中美战略博弈的重要节点。海洋的连通性会使中美南海问题扩展到东北亚以及中国台湾地区,这是中国不能忽视的问题。

## **(二)从“选择性介入”视角来看,中国的崛起打破了美国在东北亚地区维持的集中性战略优势地位,威胁到了美国在东北亚地区的主导地位**

中美权力转移必然加剧中美之间的竞争性。“霸权国考虑到崛起国战略意图和双方远期力量变化轨迹的不确定性,会优先选择成本较低的接触和优先让权战略。”<sup>[18]</sup>但美国面对非西方的中国的崛起,更愿意或更自然地悲观的视角揣测中国的战略意图,这意味着未来中美战略竞争的增多和权力让渡与分享的不现实。

目前,中美在东北亚地区并未出现实质性的权力转移,但两国间的实力对比变化已成不可避免之势。“在1990~2005年间大部分年份里,美国国力在东北亚地区所占比重大致保持在40%以上,但从2005年开始……美国这一‘单极’的国力相对下降。中国国力所占地区比例从2005年的22.8%增加到2015年的30.1%。”<sup>[19]</sup>“研究者们常常将崛起国与长期经济发展速度的不平衡联系在一起”<sup>[20]</sup>,这意味着经济以超出其他方面的速度发展很容易引起大国间的权力转移。从这个角度看,中国与美国确实已经初步具有了“主导国与崛起国”的二元结构模式了。

首先,中国在区域经济上的影响力开始向着自身军事实力的提升转化。“与其他大国相比,崛起中的大国由于经济发展速度的不均衡,而获得了更大的相对权力。这种权力会使崛起中的大国能够在地区政治秩序中要求更大的发言权,进而要求与其新力量相称的更大的安全。”<sup>[20]</sup>因此,即使是在美国的传统优势领域,中国也在不断加紧提升自身的军事现代化水平,

如辽宁号”航空母舰、东风-41洲际弹道导弹、J-20战斗机等高精尖武器。在中国信息化水平和航空航天技术进步的条件下,中国提出的“反介入和区域拒止”能力更是使美国颇为忌惮。反观美国,尽管在地区安全领域的主导地位始终稳固,却无法全面掌控区域多边经贸架构,尤其在“亚太事务中的安全因素淡化,经济因素增强,美国安全优势与地区发展的关联度下降”<sup>[21]</sup>的背景下,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美国的区域影响力。

其次,由于美国能够提供给中国的公共产品急剧减少,中国开始在公共产品的提供上自力更生。“受制于美国能力及中国需求日益庞大等条件的限制,中国能够从美国获得的公共产品越来越少,同时中国对美国关系专用性投资的规模也在缩小,这动摇了中美乃至国际体系稳定的权力基础。”<sup>[22]</sup>公共产品的自给自足除了在某程度上改变了中美的关系结构之外,也改变了中国与周边邻国的关系模式,因为中国对公共产品的提供也为周边国家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便利,这触发了美国的忧虑,美国担心中国正“以不使美国警觉的方式谨慎地反对美国的全球联盟体系,实际上一个替代性联盟正在被创造出来”。<sup>[9]</sup>特朗普上台后,在“美国优先”的口号之下,放弃美国对世界的责任,减少美国对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这给中美在东北亚地区结构关系的变化必然带来影响。

面对中美在东北亚地区的权力转移已不可避免的现实,中美之间最好的道路是“要正视对方一定的领导地位,学会分享权力和共同领导”,<sup>[23]</sup>但是,美国不会与作为非“民主”体制国家的中国分享权力。因为美国“接受中国崛起的前提消失,这种情势下的中美东北亚地区权力转移是对美国在亚洲主导地位的排挤和抢夺”。因此,从美国推行“亚太再平衡”目标的动机来看,该战略除其维护东北亚主导地位的核心目标外,还有牵制、平衡甚至“孤立”中国的重要目标。“再平衡战略标志着美国政府对华战略的根本转变,从奥巴马政府之初鼓吹的‘中美共治到集中维持美国的地区主导和制衡中国的权势和影响。’”<sup>[24]</sup>

“选择性介入”战略在奥巴马政府时期表现比较突出,集中体现在其“亚太再平衡”政策之中。毋庸赘言,就政策目标而言,“亚太再平衡”的最大特点便是侧重制衡中国。从权力转移的视角来讲,当霸权国与崛起国之间的权力转移不可避免时,“霸权国有很强的动机调整目前正在执行的接触和有限分权战略,并转而采取更具竞争性和进攻性的战略……并企图以此破坏崛起国的权力和影响力。”<sup>[25]</sup>这意味着美国“亚太再平衡”的战略手段将从曾经的“接触与防范”转变为“防范牵制为主,接触为辅”。特朗普上台之后,其所提出的“印太战略”并不像“亚太再平衡”战略那样指向清晰,但是,其对亚太地区的重视并没有减弱,2018年5月30日,美国将原来的太平洋司令部更名为印度洋—太平洋司令部,并在将来要增加这一地区的军费开支。

那么,美国如何实现“选择性介入”战略呢?

首先,美国加强在东北亚地区的军事部署以获取战略优势。在军事部署方面,在军费大量削减的情况下,为了保持在东北亚地区的“永久性存在”,美国以驻日韩基地为中心,建立了强大的东北亚基地群,并向日韩派驻大量的战斗人员,目前“美国在韩国的驻军有2.85万,在日本有3.9万”。<sup>[26]</sup>同时,以“海空一体”战略为基本构想,重视具有灵活机动性能的海军,在东北亚及其周边部署濒海战斗舰、新型水面作战舰艇、新型隐身驱逐舰DDG-1000、弗吉尼亚级潜艇等等;重点布控具有预警、侦察和应付地区突发事件效能重大的武器和武器系统。如

F-22、F-35 隐形战斗机、P8 反潜侦察机、“全球鹰”无人侦察机、“鱼鹰”运输机等,以便对地区国家进行抵近侦察;为了对突发事件进行及时的预警,美国在日本部署了两部 X 波段雷达,该雷达与在韩国部署的“萨德”系统共同对中国的导弹防御系统产生抵消的作用。以上各项措施从多方位、立体化地介入了中国的周边区域,牵制了中国的外向发展空间。

在东北亚地区,美、日、韩任何单一国家都无法取得对中国的绝对战略优势,因而为了获取集中性战略优势,美国加紧提升盟友的自我防卫能力和军事装备质量。在提升盟友自我防卫能力方面,美国主要依靠与日韩两国的联合军事演习,一方面是应对中国的“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另一方面是提高盟友与美国的联合作战能力。其一,在提升盟友防卫能力方面。除了自 2012 年起的美日韩联合军演外,美国还多次分别与日韩开展联合演习。例如美韩之间以朝鲜为战略假想敌的“关键决断”“鹞鹰”“超级雷霆”,以及引起中国强烈反应的美韩黄海联合演习等;美日之间的军事演习主要是以中国为假想敌的“夺岛”演习。除了震慑中国的目的外,美国还期望“通过特殊兵种的联合参演来弥补自卫队的相关战术缺陷”。<sup>[27]</sup>其二,在武器升级方面。美国 2014 年的国防预算中包含了提升日本“宙斯盾”系统、韩国旋转翼无人机、情报监视和侦察资产等项目,并为远程军事投送开发新型轰炸机和常规打击系统。日韩两国也积极扩充自身军备,日本在 2013 年的军费开支计划中就包括增加购买美国的 F-35 隐形战斗机、两艘“宙斯盾”战舰和多架“鱼鹰”运输机及“全球鹰”无人侦察机等。日本 2016 年度第三次补充预算案中“包括用于提高地对空拦截导弹‘爱国者-3’( PAC-3)性能的改进费用共计 1056 亿日元”,“改良型的 PAC-3 射程将提高一倍。”<sup>[28]</sup>2016 年 7 月 8 日,美韩正式宣布在韩国部署导弹防御系统,“韩国也就在事实上被纳入了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从而将会使韩美同盟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sup>[29]</sup>半岛的现有平衡被打破。虽然在 2018 年 6 月 12 日美朝领导人会晤其间,特朗普提到取消美韩军演的问题,但是美国在半岛的军事部署并不会减弱。

美国在东北亚地区与日韩两国盟友的责任分担主要表现在军费的分担上。美国早在 2011 年宣布“重返亚洲”计划之时,就曾要求日韩两国提高分担防务支出的比例。2015 年 12 月,日本政府宣称,“未来五年将把其负担的驻日美军经费开支增加 1.4%,以支持美军在亚洲的存在,应对中国的崛起”,并将自 2016 年起未来的五年内共计支出“9465 亿日元”,“平均每年预计将付出 1893 亿日元,约合 15.6 亿美元”。<sup>[30]</sup>根据美韩在 2014 年签署的新驻韩美军军费协议,仅 2014 年一年,韩国就承担总额为 9200 亿韩元(约合 52.5 亿元)的军事费用。目前,韩国大约承担驻韩美军费用的 50%。在美国的“亚太再平衡”的战略背景下,日韩承担驻防美军费用的比例将呈逐年上升的趋势。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甚至表示,日韩盟国应该承担美国驻军的全部费用。

其次,从“选择性介入”战略的视角看,为了塑造有利于美国的均势状态,美国显现了直接介入中日钓鱼岛问题的倾向。从维护美国在东北亚地区领导地位的战略目标出发,对美有利的均势状态就是中日之间的战略平衡状态。美国经常性地将中日钓鱼岛问题作为保持中日平衡状态的战略抓手。但是随着中国的快速崛起,中日之间正处于战略失衡的边缘。这种状态意味着,如果没有外力的介入,中日之间凭借自身的发展轨迹,很难恢复到曾经利美性的平衡状态。因此,不同于以往的“离岸平衡”战略,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必然是一种倾向于介

人的战略。例如,潜旭明和倪世雄就认为“美国逐渐改变了以往比较模糊的政策,积极介入中日钓鱼岛争端之中,利用日本制衡中国。”<sup>[31]</sup>胡波从涉华海洋争端方面看美国的战略倾向,认为“美国的立场已由之前的相对‘中立’转变为大幅偏向日、菲等其他争端相关方。”<sup>[32]</sup>王浩认为,“美国逐渐改变了以往在海洋领土争端中的‘不介入’政策,开始积极寻找利用海洋问题这一再平衡的新支点大做文章。”<sup>[33]</sup>

### (三)从“间接路线”战略来看,东北亚地区适度的紧张态势有利于美国在该地区的存在和作用发挥

首先,从“间接路线”战略视角看,美国利用盟友对战略威胁国家的疑惧心理来增强同盟内部的凝聚力。在强化同盟关系方面,美国采取的间接路线战略是增加日韩两国对战略威胁国家的恐惧心理,以达到获取盟友战略依赖、增强同盟凝聚力的目标。美国在东北亚地区采取“‘随机’巩固”<sup>[34]</sup>的手法,因势利导,根据突发事件引起的形势变化调整战略措施以得到有利于美国的结果。

中国的快速崛起和海洋强国战略的实施加剧了日本对中国的疑惧心理。中日之间的历史记忆、领土纠纷以及由此衍生出的民族主义情绪问题都预示着中日之间矛盾的难以调和,中国崛起之后对日本的战后报偿诉求如达摩克利斯之剑高悬在日本的心头。美国正是利用日本这种战略焦虑的心理来操纵中日之间的战略竞争状态。例如,2010年6月,与美国有离心倾向并主张与中国合作的鸠山首相辞职后,2010年9月即出现了中日钓鱼岛撞船事件,中日之间重新陷入了一触即发的紧张状态。日本重新回到了强化日美同盟的轨道上来。此后,2016年日本在自主防卫问题上提出一系列举措,实际上都得到美国的默许。2018年初日本商家“无印良品”在中国分店发的样品目录内所附地图因为没印上“钓鱼岛”而遭到中国查封,日本对此表示了强硬态度<sup>[35]</sup>,并在2018年《海洋基本计划》中突出了对离岛的防卫。虽然由于特朗普上台后对日本提出提高军费分摊、减少美日之间的贸易逆差等政策要求,使中日之间的关系开始出现缓和,但是并没有根本改变中美日之间的大国权力结构。

在朝鲜半岛问题上,2017年以前朝鲜愈发激进的拥核政策,“促使韩国政府差不多全然依靠与美国的同盟去保证国家安全,甚而去操作朝鲜问题上的韩国外交。”<sup>[34]</sup>韩国对中国在“天安舰事件”之后的表态殊为不满,开始质疑中国在协调和解决朝鲜问题上的能力和意愿。对此,“美国主流的意见认为,这显示了中国逐渐成为朝鲜问题本身而非问题解决的一部分。”<sup>[16]</sup>这种质疑间接促成了2010年11月的美韩黄海联合军演。2016年1月的朝鲜第四次核试验直接打消了韩国关于中国反对的疑虑,加快了美韩在朝鲜半岛部署“萨德”系统的决心,韩国完全被纳入了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导弹防御系统之中。然而,朝鲜半岛局势并没有按照这个方向继续走下去。2017年韩国总统文在寅上台后,积极推动韩朝关系以及美朝关系的发展,在韩朝实现会晤之后,2018年6月12日促成了美朝领导人的历史性会晤,这无疑是朝鲜半岛的转折性事件。但是,半岛将来会如何发展,仍然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而美国想在半岛未来走向上握有主导权,这一点是可以确定的。

总体而言,冷战结束后,日韩都对美国具有某种程度的离心倾向,“但美国却利用韩朝之间和中日之间一些突发事件顺风顺水地缓解了与韩国、日本的矛盾,甚至进一步强化了美韩、

美日双边同盟关系。”<sup>[12]</sup>这是美国在东北亚地区因势利导的间接路线战略的有效体现。

其次,从“间接路线”战略视角看,美国极力维持地区的适度紧张,保持地区各方对美国的战略需要。从促进地区形成符合美国利益均势的角度出发,维持地区适度紧张在无论是扰乱对手心理稳定,还是获取盟友战略依赖,维持美国东北亚地区主导地位等方面都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李海东认为适度紧张“有利于美国为其领导的联盟体系注入活力,有助于美国以其主导的联盟体系重构以孤立中国为鲜明特色的亚太安全架构。”<sup>[8]</sup>祁怀高等人从中美双边关系的发展历程角度考察,认为中国周边领土领海争端的频繁发生暴露了美国“对中美权势转移进程加以管理的真实战略目标。”<sup>[19]</sup>

美国是中日两国唯一能够接受的域外支配力量,这使美国取得了在中日之间天然优越的地位和操控空间。但是随着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实施,美国日渐显现出对中日海洋权益争端的直接介入的倾向,美国并不是在中国周边的领土领海争端,尤其是钓鱼岛争端中与中国发生直接正面的冲突,而是与日本协作提升对华周边的干扰力度。实际上,美国在中日钓鱼岛问题上采取的间接路线战略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中国的反制措施不仅进一步增加了日本的疑惧心理,使中日进入了战略对抗的恶性循环,还“强化了日本‘危机来临时只有美国可以依靠’的意识。”<sup>[27]</sup>美国利用这个机会增强了自身对东北亚地区事务的操控能力,并以此为契机阻碍中国海洋强国战略的发展进程。但这其中必须坚守的一条原则是:紧张必须是适度和可控的,不能以损害美国在东北亚主导地位 and 地区均势秩序为代价。

再次,美国更多地采取贸易战而非军事威慑来推进其对外战略,以降低中国的经济优势地位。自特朗普上台之后,美国的对外政策有很大的变化,在“美国优先”的口号之下,特朗普更加注重加强美国自身实力而不是世界贡献,其全球战略也是为了美国的发展利益服务的。因此,我们看到,特朗普虽然注重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基础,但从维护美国利益角度出发,也不惜与盟友闹掰,在同盟费用分担以及贸易战中产生争执。在东北亚地区,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依靠经济优势发挥着重要的地区性影响。奥巴马时期,美国通过 TPP 来增强美国在地区的经济影响力,而特朗普上台后不久就宣布退出 TPP,之后,中美两国以中美贸易摩擦的方式展开竞争。美国人认为,“中国摘走了自由市场的花朵,却让美国走向了衰败”,将美国的当前困境及未来危机归咎于中国的崛起。2017年下半年,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对中国展开“301调查”。2018年3月23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正式签署对华贸易备忘录,对从中国进口的6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并限制中国企业对美投资并购。几乎同时,中国商务部发布了针对美国进口钢铁和铝产品232措施的中止减让产品清单并征求公众意见,拟对自美进口部分产品加征关税,以平衡因美国对进口钢铁和铝产品加征关税给中方利益造成的损失<sup>[36]</sup>。这些被认为是中美新一轮贸易摩擦的开启。之后,虽然经过中美之间的几轮谈判和磋商,但是特朗普政府在2018年6月15日发表声明,宣布对从中国进口的500亿美元商品开始加征25%的惩罚性关税。6小时内,中国也宣布了对美国总值500亿美元产品的同等规模、同等力度的反制征税清单,双方之前磋商达成的所有经贸成果将同时失效。6月18日,特朗普又出新招,宣称将对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10%的关税,而且他进一步威胁说,若中国继续反击,美国将对额外的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追加关税。对此,中国自然再次表达了反击的立场。贸易战进行

至此,实际上已经是心理战了,它给中美关系所带来的损害不仅是现实利益方面的,更是未来发展上的。

总之,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的亚太政策离不开几种主流的战略思维的影响,并在东北亚地区有集中的体现。从历史文化发展和美国国内政治来看,美国的这些战略思维很难发生大的改变,而在这些战略思维指导之下,中美长期的竞争关系将不可避免。与以往不同的是,美国不只是在军事方面对中国进行遏制,而更多的是采取间接路线,同时打“组合拳”。这一点在特朗普时期有更明显的表现;而中国也不只是被动应对,除了尽力与美国进行磋商和谈判来解决分歧以外,中国在涉及核心利益的问题上也选择强硬态度针锋相对。在这种形势下,间接路线与类型混合将是未来一段时期美国政策的主要取向,也会深刻影响中美关系的发展。

### 三、美国几种战略思维的影响及中国的应对

美国的“新自由国际主义”根植于美国文化中的价值观念,“选择性介入”是为了维护美国的战略优势,“间接路线”是通过更隐蔽的手段强化美国的主导地位。若不想使美国丧失在世界范围的影响力,美国除了增强自身实力之外,这些战略的选择也不能丢弃,无论是建制派的奥巴马,还是特立独行的特朗普。

#### (一) 特朗普外交政策的“变异性”及“组合拳”

特朗普上台之后,虽然对奥巴马政府的外交政策更多的是否定,但是基本的东西并没有改变。从目前美国的外交政策来看,除了对传统战略思维的继承之外,也有一些“变异性”特征值得我们关注。

首先,在对待全球化发展和国际规则方面,特朗普的政策表现出与以往不同的特点。特朗普在“美国优先”的原则之下,采取了更为实用的现实主义政策,凡是不利于美国利益的方面,他都要改变,甚至改变美国倡导的自由贸易传统以及美国支配世界的国际规则。当特朗普认为这种自由贸易和国际规则损害了美国利益、而增强了竞争对手的力量时,他改变的决心是坚定的。但是,应该看到的是,他的这种改变是基于美国利益的需求的,而并非是放弃美国的价值观,也并非是完全回归到孤立主义的发展模式。

其次,特朗普的外交政策进一步强化了中美之间的竞争关系。这一点可以从特朗普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以及其后的中美贸易摩擦中体现出来。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提到中国有33次,比过去多位美国总统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提及的都多,但是,这个报告的对华政策基调是“战略竞争者”,突出了中美之间的竞争关系。之后,中美之间比较激化的贸易摩擦进一步印证了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定位。以往有学者认为,“中美在东亚地区的关系就是一种竞争与相互依存之间的平衡”<sup>[37]</sup>,但是,从特朗普政府的做法来看,贸易摩擦已然在破坏中美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使竞争关系成为中美之间的主导。

再次,中美在东北亚地区的博弈显示出特朗普政府外交政策方面的“组合拳”。作为商人出身的总统,他将美国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因此在外交政策方面不是追求军事方面的对抗,而是走非军事的“间接路线”,包括对中国的贸易战,也包括在朝鲜半岛问题上的态度转变。同

时,特朗普在外交方面也有重拳,比如在南海问题上所表现出的强硬态度和举措,在朝鲜半岛问题上的“萨德”部署和对朝鲜的持续制裁。在奥巴马政府时期,在对外政策方面也是“组合拳”,也有硬实力、软实力和巧实力的结合,但是他各方面的政策都可以从其主线推断出来,而特朗普政府实际上是在“间接路线”的基础上采取的外交“组合拳”,虽然从“美国优先”原则可以找到其政策的合理性,但很多做法显示出的是“点”,而不是“面”,因此往往出乎人们的预料。这个“组合拳”将对东北亚地区格局产生重大影响。

## (二)对中美关系的主要影响方面

### 1. 会增加中美间的战略互疑

首先,从地区格局层面来讲,由于受到美国选择性干预战略中对“集中性战略优势”和对“利美性均势”追求的影响,地区格局有向着两极格局转化的危险,这加重了中美两国对地区局势发展和彼此战略意图的疑虑。

美国以应对中国的“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为借口,一方面,加强在东北亚地区的军事部署,另一方面,强化美日韩同盟体系,实际上是为了取得在东北亚地区压倒中国的战略优势地位。美国以“海空一体”为基本战略构想与日韩两国在战术协作、武器升级和信息共享等方面通力合作,对中国周边环境的安全与稳定产生了极为负面的影响。近期,美国的军舰不仅深入中国西沙12海里区域,而且对中国开出荒诞“禁令”:如果中国不停止在南海岛礁上修建军事设施,美国将不邀请中国参加环太平洋军演。美国在东北亚一系列的战略行为说明,牵制中国是美国在这一地区的主要战略目标,这必然引起中国的疑虑。

有学者认为依照现在中美关系的发展趋势,在未来10年内,两极格局的“变化可能首先集中出现在中国的核心周边地区,即东北亚地区”,而且很有可能形成“‘事实上’的‘中美共治’”。<sup>[8]</sup>在中美互疑加深的背景下,这种“中美共治”很可能不会是希望中的中美对地区事务的“共同治理”,更多的可能是一种“中美对抗”。

其次,从国家制度与地区秩序的层面来讲,受“新自由国际主义”元素的影响,美国一直有在东北亚地区塑造以“民主同盟”为基础的宪政秩序的倾向。“中美国内政治制度和价值体系的差异是两国战略互疑的重要原因。……美国对华战略疑虑的制度和价值原因根植于其民主化情结。”<sup>[38]</sup>从美国建国起,便把自由民主写入宪法。美国不但追求自身国家的民主,也竭力把它推广到全世界各个角落。中国一直对美国战略中的这种“民主输出”保持高度的警惕,事实证明美国没有放弃这种传统的战略偏好。在东北亚,美国“不会从根本上放弃向中、俄、朝等国传播‘民主’的努力,只是其程度会随时机变化而已。”<sup>[19]</sup>从这个意义上讲,美日韩的“民主同盟”已经“变成传播和分享安全、价值观和资源的工具”。<sup>[39]</sup>美国认为,作为非西方国家的中国的崛起势将威胁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使东北亚地区出现新的与西方社会制度截然不同的力量中心,在政治多极化和国际秩序重建方面损害美国利益。

总体而言,由于深受“选择性介入”战略和“新自由国际主义”战略的影响,美国的东北亚政策的推行会加重中美之间的战略互疑。美国担心中国越来越“好斗”的行为以及价值观的差异会对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带来挑战;中国担心美国在东北亚集中战略优势和意图建立西方宪政秩序的行为实质上是企图颠覆中国的政治制度及遏制中国的发展。双方

的这种担心在未来的中美关系发展中会不时地表现出来,使中美关系出现不稳定性。

## 2. 会使中国周边安全局势变得紧张

美国通过对“间接路线”战略手段的使用,频频地在主权和领土争端问题上激化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矛盾,成功挑起了中国周边安全局势的不稳,并在一定程度上扰乱了中国外向发展的进程。美国对中国东北亚周边的强力介入,使地区合作议题渐渐成为服务于大国权力竞争和小国从中渔利的战略工具。

美国在东北亚以强化民主同盟、甚至让渡部分权力的方式扩大盟友战略自主性,默许盟友对地区事务的干预介入,“美国所谓‘再平衡’战略逐渐从‘依赖盟国’走向了‘放纵盟国’的路径。”<sup>[40]</sup>这激起了中国的反制措施,中国以维护自身核心利益的方式解决地区争端的做法在美国看来将会导致“自我孤立”的结果。这种结果正是美国战略目标所希冀达到的,也是美国管控中美权势转移进程的成功表现。“中国的和平发展既是大国崛起的进程,也是崛起的中国与周边国家相互调试的过程”,美国在东北亚地区所制造的适度紧张态势,增加了周边国家对中国的疑虑,不利于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发展。在东北亚地区,中日钓鱼岛争端和朝鲜核问题等热点问题,是美国“间接路线”战略实施的有效抓手,在这些热点问题的解决上,中国若迁就美国就势必损害周边国家利益。

## (三) 中国的应对

### 1. 缓解中美在东北亚地区的战略互疑

尽管在美国看来,中国政治体制是“非民主”的,但是中国有关和谐世界和国际关系民主化的理念则是完全以“民主”概念为理论基底的。在这种理念的影响下,中国是现有国际秩序的参与者和规则的维护者,中国追求的也是国际社会每个成员满足生存与发展的基本要求,即为国内的稳定与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但美国思维上的“伯罗奔尼撒逻辑”又使美国倾向于从权力转移和对抗的视角看待中国的战略意图。如何尽量令美国从传统思维的窠臼中走出来,如何转变彼此的认知疆界成为中美互信能否形成的关键所在。战略意图作为一种观念形式也需要在中美两国的互动之中塑造修订,为了更加明确中美的战略意图,缓解中美之间的战略互疑,减少两国在应对共同问题时的交易成本,需要中美两国从具体的问题领域、具体的地区事务和热点问题的互动中吸取经验,而作为地缘环境最为复杂地区的东北亚无疑可以成为中美之间互信积累的起跳板。

首先,中美需加强在东北亚地区问题上的信息沟通。东北亚是世界上少数还受冷战因素影响的地区之一。地区国家之间在“权力对峙的和平状态下”<sup>[22]</sup>相互防范、甚至敌对。历史记忆、领土领海争端以及冷战遗留等任何一种问题的激化都可能令东北亚地区陷入直接的军事冲突之中。作为大国,中美有责任维护东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这就要求中美之间就容易引发冲突的安全议题加强信息沟通。具体而言,以下三方面很重要:其一,构建专门的信息沟通渠道,可以从现有的中美对话和危机管控机制中衍生出专项机制。例如,可以利用2014年中美之间达成的《重大军事行动相互通报信任措施机制》为蓝本构建就东北亚地区热点问题的监控机制。这种机制应具备常规和应急两方面预案,并根据东北亚地区形势的发展而不断调整变化。其二,注重信息收集和通报的战略性和针对性。要从大战略的角度看待与美国之间的信息

流动。例如,在东北亚地区,美国在强化盟友关系的同时又放纵盟友的挑衅行为,这种看似矛盾的战略手段实际上是与美国大战略的意向相配套的。所以中国还需要从宏观的角度看待与美国的信息沟通问题,以便对信息的真伪进行辨别。其三,注意信息传达的有效性。在信息通报的过程中,中美应该注意用对方都能够听得懂的语言方式来交流,注重文化的差异性,清晰解释自己的利益诉求,以尽力减少彼此间的误解,增强彼此行为的可预期性。

其次,中美需要在非核心利益问题上达成战略妥协。中美需要明确各自在东北亚地区的核心利益,避免触碰对方的战略底线,这是中美双方在东北亚地区共处的战略前提。中国需要厘清在东北亚地区的核心利益,而不是给美国一种依据地区局势发展随意界定的错觉。例如,钓鱼岛问题和南海问题是中国的核心利益,因为它涉及中国的主权问题,因而不具有妥协性。同时,美国在东北亚地区的核心利益如同盟体系、主导地位和自由航行等,在这三者之中,前两者在中美之间已经部分形成了基本共识,那就是承认美国在东北亚地区的军事存在,也承认美国对地区国家的领导力和影响力;但关于“航行自由”问题,中美之间存在着理解上的分歧。避开这些核心问题,中美在一些非核心利益方面可以有战略妥协。比如,在当前中美贸易摩擦中,是否要让这种摩擦继续升级,争个高低上下、鱼死网破不可吗?关于这个问题,中美两国都需要谨慎思考。

再次,中美应积极塑造在共有原则上的基本共识。中国一直承认遵循民主原则的重要性,也积极以这一原则规范和约束自身的国际行为。但是美国的共有原则是在构建和维护西方“宪政”秩序的过程中生发的产物,本质上讲具有维护美国霸权体制的性质,这与中国一直以来坚守的民主内涵背道而驰。因而,在美国看来,中国的“不守规则”实质上是对美国主导下的“宪政”秩序的不满,而非实际上的观念分歧。中国应在美国需要助力的议题领域分担更多责任,在不涉及美国重大利益的问题领域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以此增加思想上的同向性和利益上的互联性,这与美国一直强调的要与中国建立富有成效的伙伴关系是相通的。基本共识的达成有助于中美两国达到相互完善、避免冲突、共同进步的良好效果,会让双方更加深入地了解和把握对方的核心利益、底线、价值理念,进而给彼此留出回转空间,避免战略冲动。

## 2. 加强与美协调打造东北亚“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高地

从大的视角来看,中国实力的上升,拉近了中美实力差距,但美国同盟体系的存在,美强中弱的格局并没有发生质的改变。奥巴马时期,美国以“再平衡”战略对东北亚周边的强力介入,使刚刚萌芽的地区合作意图渐渐服务于大国权力竞争和小国从中渔利的战略工具,美国力推的 TPP 对东北亚地区的中日韩自贸区谈判产生了明显的消解作用。特朗普上台后,将“再平衡”战略变为“印太”战略,其维持美国在欧亚大陆的主导权的实质并没有改变,虽然退出了 TPP,但中美贸易摩擦不仅会损害中美两国的利益,也会给东北亚周边国家带来损害。

首先,加强与美协作关系是中国稳定周边秩序的必要选择。为了进一步实现维护周边安全与稳定的战略目标,习近平主席在 2013 年 10 月召开的中国周边工作座谈会上提出了对周边国家“亲、诚、惠、容”的四字方针。在这四字理念的指导下,中国外交在削弱周边国家对中国的疑虑心理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如“亚投行”、“一带一路”倡议等都得到了周边国家的广泛好评。但是,在东北亚,由于受到冷战因素和历史发展的影响,地区处于离散状态,竞争与

对抗成为常态。东北亚地区是走向整合、还是继续分裂下去,这取决于中美的选择。如果中美合作管控地区争端,提供公共产品,那么东北亚秩序就会向着规范与合作的方向发展,从而形成一个整合的东北亚;如果中美选择在军事战略领域或经济领域展开竞争,甚至对抗,那么东北亚会一直持续分裂的状态,甚至情势更为恶化。

其次,以“亲诚惠容”理念塑造与美国的协作关系。大国关系是地区关系的稳定器,作为东北亚地区的主导国家,美国在东北亚地区有着很大的政策选择空间和战略回旋余地,美国以同盟体系为依托的战略纵深是地区内任一强国都无法比拟的。基于对边缘地带重要性的认识,美国对于东亚地区大国的防范举措要更为灵活和严密,如以“间接路线”战略扰乱中国周边秩序,阻碍东北亚本土机制的发展等等,但最为根本的还是强化同盟体系。美日韩同盟作为美国全球同盟体系中的重要一环,在平衡东北亚地区力量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随着美国实力的相对下降,美国“平衡”中国的战略动力也越发不足,与中国合作,让中国承担更多的大国责任,甚至让渡部分权力给予中国有可能是美国不得不采用的战略选择。“罗伯特·吉尔平认为,随着大国的对外扩张逐渐接近成本—收益均衡点,在此过程中产生的技术扩散和抵抗性联盟等导致被侵略国和竞争者不断增强,由此令该均衡点不断下移,其结果是,即使该国的扩张成本本身不增加,也会超过收益。”<sup>[33]</sup>可以预见,随着中国的实力不断攀升,美国用来牵制中国的可用的战略资源将越来越少,与中国在东北亚地区建立一种建设性的协作关系将是美国维持地区主导地位的必然选择。

最后,推动韩国成为减震润滑中美关系的有利杠杆。虽然中美在韩国的外交关系中具有不同的“战略等级”<sup>[10]</sup>,但在合作基础上韩国与中国、美国是没有等级之分的,有的只是“议题之分”。因为韩国的战略选择表现出了明显的“议题导向”特征,具体而言,就是“在政治、安全等问题上依赖美国,在经济、社会、历史等低政治议题上接近中国”。<sup>[19]</sup>韩国的这种战略选择源于其所处的复杂地缘环境。处于大国林立、敌国对峙的地缘环境中,韩国天然就具有灵活应对各方关系的外交能力。随着中国的崛起、美国对东北亚的介入,韩国的这种战略灵活性受到了一定的损害,这种损害在美韩宣布建立“萨德”系统时达到了一个峰值。但不能否定韩国在减震中美关系上可能具有的能动效应。

具有重商主义传统的韩国无法忽视中国巨大的经济潜力和市场,也无法忽视朝鲜半岛问题及中朝特殊性关系给自身带来的安全威胁与紧张感。在这对此消彼长的关系中,当朝鲜带来的威胁感上升的时候,韩国选择更加密切与美国的关系;当这种威胁感相对缓解时,韩国选择密切与中国的联系。正是韩国的议题导向战略赋予了韩国减震润滑中美关系的能力:在经济领域,韩国可以发挥其协调人的作用,将美韩自贸区与中韩自贸区联合起来,从而为中美创设一条共同参与经济竞争的轨道,促使东北亚秩序朝着规范与合作的方向发展。在安全政治议题领域,韩国可以充当传播中国利益诉求和战略意图的话事人,一方面,美国引以为自豪的民主制度“保证了其他国家可以经常参与美国的决策过程”;<sup>[3]</sup>另一方面,“美国更易倾听盟国和朋友的批评”<sup>[16]</sup>。这意味着,具有民主国家和盟友双重身份的韩国完全可以胜任这样一个角色。就韩国的意愿而言,由于“萨德”系统损害的中韩关系需要及时修补,并有很大的可能会选择加紧恢复与中国的经济联系。中国也应该抓住韩国修补意愿强烈的有利时机,积极推

动韩国成为减震润滑中美关系的有利杠杆。

#### 四、结论

美国的东北亚政策主要深受“选择性介入”战略、“新自由国际主义”战略的影响,并在实施的过程中呈现“间接路线”战略的元素。“选择性介入”使美国着力在东北亚地区建立压倒中国的集中性战略优势;“新自由国际主义”促使美国在东北亚地区建立以民主国家为基础的同盟网络;“间接路线”则使美国在东北亚利用地区国家间的纠纷、矛盾增强同盟凝聚力,扰乱中国心理稳定,保持地区适度紧张,形成有利于美国主导地位的局势。这在某种程度上不仅加深了中美之间的战略互疑,还使中国的周边环境陷入了动荡不安的状态。可以说,无论是谁做美国的总统,美国这几种典型的战略思维都很难改变,而且会长期影响美国的现实政策选择,这也决定了中美之间的战略博弈关系也将长期持续。在这种情况下,中美之间要达到“斗而不破”,就必须加强交流,不断协调彼此的利益诉求,避免冲突的发生。在东北亚地区,中国在加强与美国协调关系的同时,必须关注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发展,不能以大国关系为由牺牲周边国家利益,中国要积极塑造良好的周边环境和周边关系,以增强其在地区的影响力。

#### 参考文献

- [ 1 ] 刘建飞.中美全球与亚太地区安全目标矛盾及其应对[J].东北亚论坛,2013(3):3-12.
- [ 2 ] 潘亚玲.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动力变化以及中国之应对[J].现代国际关系,2015(1):58.
- [ 3 ] [美]约翰·伊肯伯里.美国无敌:均势的未来[M].韩召颖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215-230.
- [ 4 ] 赵明昊.迈向“战略克制”?——“9·11”事件以来美国国内有关大战略的论争[J].国际政治研究,2012(3):155-156.
- [ 5 ] 达巍.全球再平衡:奥巴马政府国家安全战略再思考[J].外交评论,2014(2):58.
- [ 6 ] Robert J. Art. A Grand Strategy for America[M].Ithaca.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5.
- [ 7 ] 周丕启.国家大战略——概念与原则[J].现代国际关系,2003(7):60-61.
- [ 8 ] 安德烈·博福尔.战略入门[M].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部译.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89:106.
- [ 9 ] 李海东.当前美国对华政策的辩论、选择与走向分析[J].美国研究,2016(4):28.
- [ 10 ] [韩]李熙玉,于婉莹.“均衡”的东北亚国际关系与半岛安全结构[J].政治学报,2014(4):449-450.
- [ 11 ] 凌胜利.冷战后美国亚太联盟的强化:趋势与问题[J].美国问题研究,2012(2):136-137.
- [ 12 ] 陈积敏.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与中美关系[J].亚太纵横,2013(3):12.
- [ 13 ] Anne-Marie Slaughter. America's Edge: Power in the Network Century[J].Foreign Affairs, 2009(1):94-113.
- [ 14 ] 李开盛.东北亚地区碎片化的形成与治理——基于分析折中主义的考察[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4):21-38.
- [ 15 ] 陈积敏.特朗普政府同盟政策走向评估[N].联合早报,2017-01-17.
- [ 16 ] 陈雅莉.美国的“再平衡”战略:现实评估和中国的应对[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11):65.
- [ 17 ] 2018 香格里拉对话会:争论与合作并存[EB/OL].<http://news.cri.cn/20180602/5a898d0d-6905-7f47-b881-c1efb426deb0.html>.2018-06-02.
- [ 18 ] 张泊汇.国际现实主义理论与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J].国际关系研究,2014(2):18.

- [19] 祁怀高,李开盛,潘亚玲,吴其胜.未来十年东北亚地缘政治结构的变化及其影响[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8):137,153.
- [20] [美]罗伯特·S.罗斯.中国崛起、地区权力转移与东亚安全:从1949年到21世纪[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11):36-37.
- [21] 吴心伯.奥巴马政府与亚太地区秩序[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8):59.
- [22] 冯维江.中美权力博弈与新型大国关系的演进——基于公共产品与关系专用性投资的视角[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11):123-124.
- [23] 凌胜利.中外学者论中美互动与亚太新格局[J].和平与发展,2015(6):50.
- [24] 吴心伯.论奥巴马政府的亚太战略[J].国际问题研究,2012(2):74.
- [25] 张泊汇.国际现实主义理论与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J].国际关系研究,2014(2):18.
- [26] 阮宗泽.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前景论析[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4):15.
- [27] 刘卫东.美国对中日两国的再平衡战略论析[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10):89.
- [28] 日本年内第三次追加军事预算 升级爱国者导弹防御性能[EB/OL].<http://www.chinanews.com/gj/2016/11-28/8076243.shtml>.2018-03-28.
- [29] 韩献栋.美国“亚太再平衡”背景下韩国的外交安全战略[J].现代国际关系,2015(3):13.
- [30] 日本增加承担驻日美军军费 配合美国再平衡战略[EB/OL].<http://www.cankaoxiaoxi.com/world/20151217/1029149.shtml>.2017-01-20.
- [31] 潜旭明,倪世雄.中美在东北亚竞逐兼容关系分析[J].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015(3):118.
- [32] 胡波.中美东亚海上权力和平转移:风险、机会及战略[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3):35.
- [33] 王浩.过度扩张的美国亚太再平衡及其前景论析[J].当代亚太,2015(2):10.
- [34] 时殷弘.美国在东北亚:权势阵地的随机巩固[J].现代国际关系,2012(1):11.
- [35] 中日就钓鱼岛再起争执 安倍强硬表态[EB/OL].<http://www.zaobao.com/special/report/politic/sino-jp/story20180201-831725>.2018-06-14.
- [36] 中美贸易战[EB/OL].<https://baike.so.com/doc/8417243-8737018.html>.2018-6-19.
- [37] 金灿荣,刘宣佑,黄达.“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对中美关系的影响[J].东北亚论坛,2013(5):3-12.
- [38] 李永成.战略意图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J].外交评论,2013(5):29.
- [39] [法]夏尔-菲利普·戴维著.安全与战略——战争与和平的现时代解决方案[M].王忠菊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155.
- [40] 金灿荣,段皓文.当前中美关系的问题与出路[J].国际观察,2014(1):71-83.

〔责任编辑 李英武〕

## ABSTRACTS

###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Foundation of Xi Jinping's Thoughts on Diplomacy**

XING Li-ju · 3 ·

Abstract: Chinese cultural traditions are as important founding stones for the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as the sources for Xi Jinping's thoughts on diplomacy, which is deeply rooted in the extensively profound Chinese culture, with its anchor in creating an external environment more congenial to the peaceful development of China. Such notions included in the cultural traditions as peaceful development, reciprocity and win-win, mutual learning of best practices, and an open embrace of tolerance and inclusivity are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of utmost importance for China's undertaking of its firm continuing to walk a path of peaceful development, to drive the building of new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to construct a universal community with shared destiny.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he mode of global governance, a holistic approach to homeland security, cultural exchange and mutual learning, an eco-friendly view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many more ideas no less laudable than these – all these, as the essential parts of which Xi Jinping's thoughts on diplomacy are composed, are in no small way embodiments of the connotations of Chinese cultural traditions (e.g.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connectivity and collaboration, a holistic approach, tolerance and complementarity, and harmony and co-existence). Xi Jinping's thoughts on diplomacy are inspiring to the extent that more efforts need to be dedicated, in an active manner, to the transformative innov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ultural traditions, to a strengthening of the humanities exchange with other countries, to drive forward the building of China's capacity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nd to take stock of all inspiring elements from other cultures, in order that a future-oriented approach be adopted, a socialist civilization brought to greater prosperity, and national soft power elevated to a new height.

Key Words: Xi Jinping's Thoughts on Diplomacy; Chinese Cultural Traditions; A Universal Community with Shared Destiny; Peaceful Development; Reciprocity and Win-win

### **The "New Perspective" on Chinese Diplomacy towards Japan in New Era: Brief Comment on Xi Jinping's Diplomatic Thoughts to Japan**

WU Xin-bo GAO Zi-jing · 19 ·

Abstract: It is time for China to enter a new era and the 40th anniversary of "the Sino-Japanese Treaty for Peace and Friendship" in 2018, the Sino-Japanese relations have also ushered in a new historical turn. In the new era and the significant historical starting point, both China and Japan need to have a new understanding and a new perspective of each other. China's new understanding and perspective on Japan are contained in the grand strategic planning for "Diplomatic Thoughts towards Japan" from a new generation of supreme leader in China. Through the organization, induction and conclusion on "Diplomatic Thoughts towards Japan" of Xi Jinping, we can not only summarize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the Sino-Japanese relations in the past decade from China's standpoint, but also put the Sino-Japanese relations into the grand framework of "Diplomatic Thoughts towards Japan" of Xi Jinping, and it also has very special strategic significance to understand the future direction of Sino-Japanese relations.

Key Words: Xi Jinping's Thoughts; Sino-Japanese Relations; Chinese Diplomacy towards Japan; A New Perspective; Japan

### **The Sino-U.S. Strategic Game in Northeast Asia: Indirect Approach and Mixed Model**

LIU Xue-lian FAN Wei · 32 ·

Abstract: Under the Obama's presidency, the rebalancing strategy of the U.S. in Northeast Asia had partially abandoned the original model of "off-shore balancing" to a fresh new type of mixed model which comprises "selective intervention", "new liberal internationalism" and "indirect approach". Through adopting the selective intervention strategy, America has been urged to devote itself to maintain the absolutely strategic dominance over China in northeast Asia. Guided by the new liberal internationalism, the U.S. has established a network of alliance based on the nature of democratic states in this region. And then, according to the indirect approach strategy, it exploits antagonism and hostility among the regional countries to strengthen the cohesion of its alliance system, disturb the psychological stability of China, keep a kind of moderate tension in Northeast Asia, and try to form an advantageous leading position of itself. In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the indirect approach comes to a new height, meanwhile the combination of the mixed model also represents some changes obviously. These changes not only intensify the strategic distrust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but also aggravate the situation of China's peripheral relation. Therefore, in order to buffer the tensions of two great powers, China needs to take measures to relieve the strategic distrust on three levels. Firstly, China should enhance the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with the U.S. Secondly, China needs to reach a strategic compromise with the U.S. on non-core interests. Thirdly, China needs to reach a basic consensus on "shared principle" with the U.S. Meanwhile, China needs to strengthen the strategic cooperation with the U.S. in Northeast Asia, create a sound coopera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its neighboring countries based on the ideas of "amity, sincerity, mutual benefit and inclusiveness".

Key Words: Sino-U.S. Relations; Northeast Asia; Selective Intervention; New Liberal Internationalism; Indirect Approach

### **Transformation of the Global Governance and the Orientation of the Responsibility of China: A Study on the Basis of the Nature of the Global Problems**

XUE Xiao-peng · 49 ·

Abstract Since the ending of the Cold War, with the disappearance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bipolar confrontation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on the one hand, for the lack of dominant forces, is elapsed into a chaotic condition, while on the other hand, all the nations, on account of the furtherance of the globalization, unprecedentedly come into interdependence with each other. No outcome of any importance, however, is realized even as the means to the solution of those problems has been being sought in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Theoretically and practically, global governance, faced with tremendous difficulties and challenges, is in great need of transformation, so as to realize the improvem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and governance procedure. It is necessary that studies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global governance commence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global prob-